

用诗意的目光触摸民间世界

□张德明

我不知道贺小晴是否写过诗歌,但她小说中总有表现突出的诗化特征,却是不争的事实。我曾说过小说的整体风格是惊艳的,其独特的视角、别样的叙述、精怪的故事、诗化的语言,渗透其间的生命感悟和深沉思考,往往令人耳目一新。她早些年创作,曾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与当下生活近距离接触的稚拙,甚至留下的现实经验世界的痕迹是那么明显。但近些年,尤其是从“鲁院”毕业以来,她的小说创作有了从经验世界到审美世界的优雅转变,这在她近期发表的《麻利花》(《中国作家》2013年第2期)、《扶桑》(《清明》2013年第1期)、《成长纪》(《青年文学》2013年第2期)几部中短篇小说中都有比较理想的表现。

客观地说,贺小晴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作品也不少,发表刊物质量也不低,文学履历应该说不可谓不丰富,但总让人感到,在这个疯狂炒作的时代,她多少显得有点“孤独”。在贺小晴的文学世界里,读者会发现,她不仅时常游弋于被主流文学忽略的边缘地带:草根、民间、下层,还固执地盘踞在这样的领地中,以飞翔的女性神话注视现代性对人们生活的广泛交涌。她将各色人物聚于人性的观照之下,检测着人性的表现与价值。她的关于人生故事的遥远而温馨的城乡记忆,模糊而真实,人物琐碎生活的无奈,沉陷于近似异常的叙述之中,连那最不堪的日常经验,也都带上了笑和温暖的光环。读着这些小说,能够让我们的阅读记忆迅速鲜活起来,同时又不断有理性的力道拨动你内心的敏感之处。尽管贺小晴不是一个善于营造文学氛围的作家,但她往往在不经意间给读者一个意外的小说结局,留给人们无限的深思和畅想。仔细想来,曾经轰动文坛内外热闹空前的所谓“美女作家”,如今究竟还有多少在坚持着朴素写作,而且,受市场俗世法则的影响,她们写作的数量较之热闹的世纪之交也减损了不少。年龄几乎与之相仿的贺小晴恰恰是比较稳定地坚持自己写作理想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无论周边的声音如何嘈杂,无论手中的工作多么沉重,她都基本能保持冷静,坚守自己的文学立场,这在那场许多人弄潮不成反而呛了几口浑汤的尴尬局势中,显然十分难得。

贺小晴运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崭新的文学情景,按自己的意绪对这个混乱无趣的世界进行重新组装,她感觉的细腻和描写的精致让作品在故事之外延留经久。

《麻利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短篇,同贺小晴很多写职场女性的作品不同,它写的是职场女人在职场之外的人性表现,剖析更为深刻,节奏更清晰,控制力更好,小说整体气象更为开阔,在圆润柔软中添加了一些锋利的元素,读来劲道十足。报社策划紫冰

同顶头上司吴副总出差,迫不得已的原因使这对平素互不买账的女人同居一室,那种沉闷无语的戒备与内心悄然的敌视和对峙昭然若揭。平心而论,紫冰的才华和工作能力,让死拼烂打才成就今天模样的吴副总在内心是认可嘉许的,但别扭的个人生活又使她对率性活泼年轻漂亮的紫冰有着一种天然的妒意,中年女性逝去的时光,使她在紫冰面前本能地拒绝青春,紫冰以退让和无争的态度寻求自在,这在她眼里更是一种老谋深算和蓄意挑畔。其实,靠着昔日青春的代价和今天破败的家庭换来某种地位的吴副总之内心是极度虚弱的。美与无所谓使紫冰战无不胜,在告别晚宴和舞会上出尽风头,吴副总的落寞使她有一种报复式的恶作剧快感,曾经,吴副总是那么模糊不清、高高在上,因为在这个被贺小晴认为颠倒势利的世界中,她太具权威性和孤芳自赏。当面具抖开、人性露头的时候,吴副总的可爱便回归了,她甚至在紫冰面前变得低三下四,讨教服饰品相,并东施效颦。在文本充满性感的语言中,主流话语的确被放逐了,常见的象征性的对女人的珍爱不再成为旁观。

我读过很多贺小晴的作品,发现她总是将人物处境与人物性格推向极致,这其中更多地考虑也许是为了凸现人性特征,更深刻地揭示人性裂变及其可能达到的程度。她笔下的人物有奇特的甚至荒诞,这恰恰凸显了颇有深度的人性表现。《扶桑》借川剧老艺人“父亲”(老苏)形色无边的跌宕人生,讲述在社会时代风云际会之下艺术人生的双重变化。老苏在一个县级川剧团干了一辈子司鼓,这个沉寂淡然的草根艺术家有着矢志不渝的川剧情结。为川剧他投入全部的热情和心力,甚至付出了生命,以创造自己的舞台人生。舞台上,他像一只充血好斗的公鸡,腾挪生风;舞台下,他却像一块燃烧殆尽的废炭,冷漠刻板、了无生气。他是一流的司鼓,却又是死板的男人。经济转型,剧团解散,老苏退休。很多同行为生计而四处乱唱晃荡,别人也劝他到茶馆唱戏,他断然拒绝,却意外地接收了一位他向来看不上的草台剧团的女生婉西为徒,并将她培养成台柱,声名鹊起,而他却在婉西如日中天之际西去。老苏性格中有种痴迷不悟,这是一种深入骨髓很难改变的人性。小说的极端描写确实令人震撼,虽然略显夸张却深刻揭示了人性特征。人性的这种固执,使读者惊愕地感到:人性世界如汪洋般深不可测,而且隐匿着许多令人微妙的东西。这是贺小晴的独到之处。由于这种认知,贺小晴小说显示出一种浓郁的主观色彩,沉郁的岁月沧桑,到处游走的神灵人性,是她小说时常出现的人生景象。在俗世之中,只有充满内心定力的作家,弃绝华艳用心灵感知大地人生沧桑与深度的作家,方可

那么,祁乡长的尴尬就不能不说更是基层生活的尴尬了。小说《上访》塑造了一位一心想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乡长——祁乡长。从农村权力机构设置来看,乡长可谓乡中的最高官员。但是,乡长也有自己的苦恼。他想让农村富起来,但又苦于没有资金支援,到处想办法拉赞助、找关系,甚至不惜牺牲小姨子珍珍的“色相”。资金最后倒是真的批下来了,祁乡长还得了块“公道人心”的匾,但是众人在喝酒的时候,他脸上是笑的,内心是流泪的。

作者以一个平视的视角,用放大镜的方式来观看农村生活,甚或查验基层工作人员的内心,才有了这么生动的笔触来描写农村生活的苦与乐。乐有着更多的悲凉和无奈,但是,在乡亲父老、亲朋好友面前,又要收起自己的脆弱,温婉地来对待生活,享受着通过自己的智慧不断解决生活尴尬的快乐。乡村的世界,不是一个权谋的世界,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世界。这个世界里,也许有的情感不会生根发芽,但是它会带来美好,让我们一直为之向往,从而忘却生活的尴尬。

二、人性凄苦的温情

当我们在现代的写作中逐步“剔除”了人性”,杀死了“人”,那么,小说就会成为一个人性泯灭的屠戮场,文字里面多了些刀光剑影,少了些温婉的同情。尤其,当我们的视域延伸到乡土文学,关注百姓疾苦和生活状况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继续着鲁迅先生的“怒其不幸,哀其不争”的“金刚怒目”,少了些对乡土的厚爱和对百姓的同情。

《春季里那个百花香》塑造了一位性格率真、能够抛头露面、比较有威信的农村妇女形象红鞋。当生活愈来愈富足的时候,农民闲下来是一件很纠结的事。那时,老百姓更多表现在精神生活的空虚匮乏和无聊。村长侯方想要借闹社火扭秧歌,丰富农村的业余生活,让人们欢庆丰收、分享喜悦。但是,他转了一圈,婆姨们听说扭秧歌没有补助,对这个东西都不感兴趣,市场经济规则已经在不经意间侵袭了所有乡村。村子里婆姨们“一些在信耶稣,一些在领娃娃,一些在打麻将”,精神的空虚匮乏尽显无疑。但是,当人性受到金钱蛊惑的时候,人的心灵被欲望的洪水冲得到处都是沟壑。集体主义精神,甚或奉献精神都在阡陌纵横的心灵田野间游荡,而不能团聚。还好在侯方解决了红鞋的难题之后,红鞋将秧歌队张罗起来了。但生命中总有些“乐极生悲”的事。警察抓赌,红鞋公公三娃被误抓进了派出所,然后不幸不白死了。偏偏红鞋笃信基督教,与当时正在村子里到处发展的门徒教结了梁子,为了讨个说法,没有下葬公公三娃老汉,被人诬告,抓进了派出所。

当小说结尾,侯方方不合时宜的手机铃声打破了基督教堂里祥和安宁的氛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老百姓虽然有着凄苦的身躯,有着无法言说的不悦,有着无处表达的不满,但是当温情降临人间的时候,

成就自己的审美品格。

贺小晴的小说具有一种抒情意味,运用各种手法、情绪,书写人们的心灵秘史。我们感知到她拒绝屈服和热切的人文渴望,对暧昧世界的深切失望,亦从反面证实了她的理想情怀。

生命个体的成长其实包含了身体成长和精神心理成长两方面。如果说前者大同小异,平淡无奇,那么精神成长则因其万千姿态而彰显了生命的神圣与瑰丽。精神成长是人生最真实的记录,它最大程度地表达着人的心灵质地。《成长纪》以独特的方式和充分的想象,反映了个体人生所经历的精神炼狱和残酷自省。受传统的影响,中国的成年人对孩子许多天真好奇的问题的回答常常要么显出自鸣得意的东方式的狡狴,要么王顾左右答非所问。小时候妈妈说“我”是捡来的,让“我”深感内疚和自卑,久而久之,“我”成为全家最听话的人。班花与男生“睡过”的传闻使“我”等人人自危。小说写出少女成长发育过程中的生理心理变化,如少女初潮袭来的疑惧、恐惧乃至绝望,对异性朦胧的感觉,对性的着迷。作品将人物心理固定在生命感受最为敏感和人格定型最为关键的青春期。如果没有贺小晴在真实上的积极甚至刻意的努力,读者也许根本无法承认作品的事有多大的可信性:班班班花集一身的李月明居然先后与不同男生睡觉,最后不得不转学;“我”这个不动声色的丑小鸭竟然与邻居小子打了场身体遭遇战而怀孕。正如昆德拉所言:“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筒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他们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小说中的人物既懵懵懂懂又自以为是。妈妈的冷冰和傲然令人不快,母女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体己的交流。“我”在沉闷环境中对孤独的品尝,在群体中的沉默无言,在狭小空间里的顾影自怜,都是人物欲望收缩时的心理自卫,她不向周围的所有人表露自己的真实欲望,在心理上有强烈的隐蔽欲,她沉醉于自己的孤独,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家庭教育的生硬简单缺位让初开的情窦钻了空子。成长的过程总是伴着对抗与比照,有甜蜜、苦涩、天真、恐惧,有说得出的幸福,也有不可名状的疼痛,由此串起一部成长史。每个人每天都在对付当下,对付现实,无路可逃,贺小晴表达了一种很雅致、很理想、分寸感很强的现实关怀。

这些年,贺小晴一直用一双湿润的眼睛关注着嘈杂的世界,将她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毫不保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没有虚伪,没有矫饰,只有诗般殷殷的诉说。在一个大转型的时期,在一个慌乱而难以作出文化选择的时期,这是对一个人镇静、勇气和洞察能力的严峻考验。

走在思考的路上

□樊文春

他们还是会痛痛快快地”闹社火,扭秧歌”。

三、情感世界的纯洁

情感世界,是一个很难让人捉摸的东西,人是感情动物,人有了情,才有了活性,才有了眉眼,才有了人与人之间交流与合作。乡村世界的情感是淳朴的,更是纯洁的。在这个纯洁的情感世界里面,村子里的人格守着传统人伦道德的制约,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忍让谦逊,逐步形成了乡村情感世界的秩序。但是,在城市文明逐步浸染乡村的时候,村子里的很多人像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一样,染上了“城市文明病”,寻求刺激,聊以感情慰藉为寄托。

《抓捕》讲述了一个留守在家的村妇田翠花遭到了侮辱,来到警局报案。民警折向东等人到田翠花家蹲坑,准备抓住这个行凶者。但是,为了能够将罪犯抓个现行,人赃俱获,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罪犯再次侮辱了田翠花,罪犯还逃之夭夭。田翠花并没有因为这个记恨民警,而且还提着鸡蛋去折向东家请求他撤了这个案子。最终真相大白于天下,是田翠花自己炮制了这个案件。民警折向东的前途因为这个案件毁了,他怒气冲冲来到看守所,伸手要扇田翠花一个耳光的时候,“手伸到空中却停住了”,因为他看到了田翠花满脸的泪花,看到这个已是三个孩子母亲的楚楚可怜,她眨巴着惶恐的眼睛躲在角落下,像一只受了惊吓的老鼠。案件中虽然有田翠花的自私,只有她自己的小九九,但是她无心害人,对待人,包括民警都是善良的。她的本意是吓唬吓唬范大,但是没有想到陷进了事情里面。她的淳朴善良、真挚的感情,虽然间接地害了折向东,但是也让他看到了她的柔弱和那份通透的纯洁。

侯波的小说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情感描述,比如《上访》中祁乡长和小姨子珍珍的暧昧关系、黑牡丹对祁乡长的情谊,作者把控得很好,写得很纯洁,很有美感。《荒野》中姐姐与日本人俊部以及墩的感情,虽然有着更多的血腥和凄婉,但是作者将他们写得很纯洁,很有想象力。小说《岩窑窑开放的那个夏天》,作者以清新练熟的笔法回忆了大学的美好生活及其懵懵懂懂的爱情生活。人性的情感世界孕育着一抹阳光,当我们走近她,就会发现她是那么美好,那么浪漫,那么纯洁无瑕,晶莹剔透。

自古以来,陕西就是皇天后土、文化之地。黄河弯弯曲曲流过,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所以,在陕西作家群里面,要想脱颖而出,杀出重围,还真得需要一番努力。侯波之所以能够出来,是因为他的思考,他对待百姓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关注,而且是以一种温情的视角持续的关注。他用爱来写作,用心来思考。他的写作之路,会因为思考而长远地走下去,并有望看到奥林匹斯山神祇的智慧之火。



吴 臣 摄

初识蔡东,始于《往生》。犹记阅读这篇刊于《人民文学》2012年第6期的作品时的感受,一个花甲儿媳照料罹患老年痴呆的耄耋公公,日常纷繁境况下缕缕爱恨交织的情感所引发的心酸与心痛阵阵袭来。作者引领我们走生命中晦暗的角落,还原被忽略、漠视的细节,唤醒麻木的感受。文章所传达的诸般况味,令无此经历者亦能深切体悟。

再识蔡东,缘于《无岸》。这篇刊于《人民文学》2013年第3期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因女儿出国留学引发家庭经济危机,进而导致家庭生活转折的故事。读至最后,几欲流泪。原来幸福家庭的表象如同绚烂的气泡,经不起丁点的刺破。或许,生活中的我们,某一天就会变成永远无法靠岸的孤舟,这份在洪流中翻腾浮沉、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拼命抗争的存活,又能让原有光泽的人生维系多久?文章中那些所谓成功者,看似有岸可依者,又有谁是真正的体面而优雅,像我们理想中那个自己?

《往生》与《无岸》之后,接着读了更多蔡东的作品来读,譬如《天堂口》《断指》《木兰辞》《福地》等。我也从一篇访谈中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蔡东的写作经历可分为两段,以2006年为界线。她于2003年开始写作,并在2006年毕业前夕发表了《天堂口》(《人民文学》第3期)与《断指》(《芒种》第5期)。硕士毕业后,因赴深圳工作而中断写作,并在2010年恢复。《往生》是她恢复写作后的第一部作品。

在蔡东为数不多的作品里,有三篇是我非常喜爱的,除去前面大概介绍的《往生》与《无岸》,另一篇为《断指》。这三篇作品,题材各异,关注的问题也不同,却都具有令人动容的力量。

这三个作品的主人公均为女性,她们善良贤惠,爱家庭、爱丈夫、爱子女,即使丈夫不忠、无为,也会最大限度地去体贴他、原谅他。《断指》中余建英的丈夫出轨,还因情人而欠下公司巨额外债,面对这些打击,余建英选择与丈夫一起还债,并且为了还债主动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去农村开办小厂子赚钱;《往生》里的康莲已经60岁了,依旧耐心地照顾公公,还在小叔子一家的推脱中独自承担这份辛苦;《无岸》中柳萍为了女儿上学,四处奔波,受尽委屈,令人慨叹。这些女性平凡又伟大,她们的身上散发着美与爱的光。

可是,她们又都是那么的不幸。读蔡东的《往生》,脑海中浮现出的是菲利普·罗斯的长篇散文《遗产》,是伊朗的电影《一次别离》,它们都为我们讲述了疾病与衰老给老人的躯体、给子女的内心所带来的影响与震撼。《往生》中康莲已经60岁了,这个本来应该享受生活的年纪,却不得不去照顾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公公。老公在外奔波养家,无暇顾及老父亲、小叔子一家为推脱责任躲躲闪闪,所有的劳累都落在了康莲的身上。她抱怨过,生气过,但最终还是耐不住心坎,扛起这份重担,以至于最终心力衰竭死去。《断指》中,余建英先是面对丈夫的背叛,接着是巨额的债务,她没有躲避,而是选择与丈夫一起渡过难关。她在乡下开厂房,结果导致在那儿打工的亲戚家的女孩子失去了四根手指。她依旧没有躲避,勇于承担责任。只是这份良善却要面对来自亲戚的刁难,以及亲妹妹的陷害。《无岸》中的柳萍,面对女儿近200万的留学花销,陷入愁苦的境地。她想卖掉房子,申请学校的周转房,却受尽屈辱也未能成功,她以为自己与同事相处融洽,后来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是微不足道被人忽略的那一个,最后她只好与同样自贵的丈夫紧紧搂抱在一起相互取暖。

蔡东在她的作品中向我们一点点展示了人的体面如何沦丧、良善如何受辱、理想如何萎缩的过程。在蔡东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这三位女性所代表的光明与爱纵使只有幽幽豆火也要拼命燃烧的渴望与努力,也看到了那些追求美好的人生如何千疮百孔也百折不挠的悲壮。

关于何为好小说的评判,见仁见智。我更偏爱展示困境、读来令内心深受撕扯与煎熬的作品,它们的魅力就在一种“想而不能”的纠结之中。一个小小的事件,如一把锋利的刀,划开包裹人生的囊壳,只见人性的善在恶的层层包围中,四处躲避,仓皇逃窜,时而抗争,又因过于心善而妥协。鲜明的恶固然可气,伤害也是直接的,只是那些有意无意、带着犹豫从善转化成恶的,在与他者的善的交锋中,渗出钝刀割肉般的疼痛。蔡东的作品就是如此。她像一个高超的工匠,为希望寻觅着一个出口又决绝地封闭,我们目睹着希望在遍体鳞伤中趋于绝望。我们看着看着,心酸与眼泪缓缓地浓浓地聚涌,然后在文章的结尾处,在康莲倒地的瞬间,在余建英梳理自己半生的瞬间,在柳萍与丈夫紧紧搂抱的瞬间轰然决堤。

蔡东所带给我们的悲伤,缘于三位女性的不幸,更缘于她们在反抗不幸的过程中更加不幸的不幸。

这三个作品之所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主要在于蔡东对文中人物,尤其是三个女性主人公的成功塑造。蔡东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充满感情,用心对待她们,她在创作中紧贴人物心理,切身体悟人物的言行举止与事件走向。所以,她笔下的人物熨帖、自然,毫无造作、生分之感。蔡东的作品展示了日常生活的一种,其中并无神秘与稀奇的人与事。所有的人物各归其位,说着属于自己的话,做着属于自己的事。同时,她很注重对细节的刻画,在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场景的背后,力图展示人物的情绪与状态。譬如《断指》中秀俊在得知女儿手指出事,余建英“发现秀俊的黑棉鞋穿反了”。再譬如,写到余建英家庭从殷实富足转入衰败的时候,她却写“七株颜色各异的月季花娇艳动人,两棵石榴树满树花,开得富贵红火”。所以,这些人与事虽平淡庸常,结构在一起却又内蕴丰富,气象万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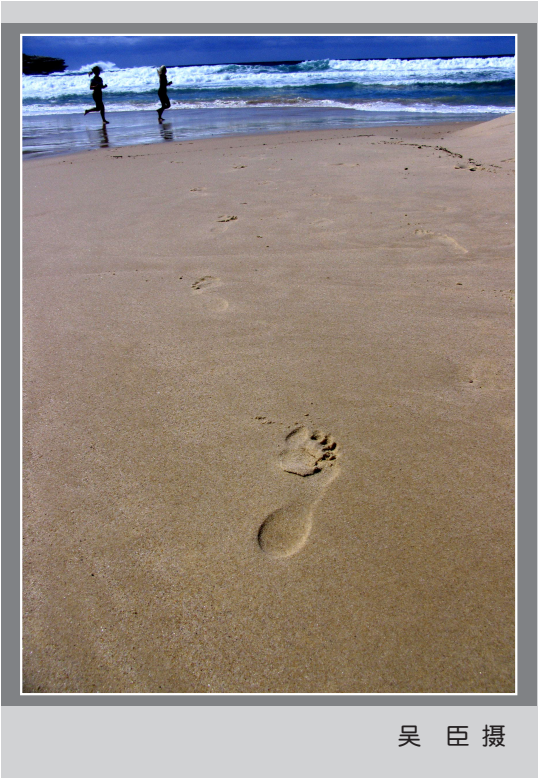
作为一名“80后”的年轻小说家,蔡东并未过多叙写自己,她的创作除去《天堂口》带有自身的影子外,其余的作品均为对他者的观照与体察。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仅要善于讲述自己的故事,更要善于从对他者的观察中提取对生活与人性的反思。在这三篇作品中,蔡东关注老年人的生存境遇,关注中年女人的生存状态与内心生活,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千丝万缕的牵连。她的作品在城市思维与乡村伦理中,在不同年龄的人之中自由游走,毫无隔膜,可见她对人生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与感受力。而这,让她具备了成为优秀作家的条件。

另外,蔡东的作品不仅有她熟悉的生活常识,有她领悟的生活见识,还有许多生活的情趣在其中。她对穿着、配饰、美食有留心,也对茶、画有研究,这些情趣与其作品语言的准确、凝练,对善与美的追求,以及对人生困境的追问,共同构成了她充满魅力的文学世界。

在授予《往生》首届“柔石小说奖”的颁奖词中如是说道:“《往生》以细腻的观察、悲悯的情怀、令人动容的文笔,描绘出晚年面对疾病和死亡这两大日常性威胁时,人类的无奈、困窘和挣扎,以及互助中建立的善意、体恤与牺牲。小说虽出自年轻作者之笔,但它描写的老境充满令人信服的细节与感染力,体现了蔡东非凡的潜质与内力。”我认可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更相信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即她有“非凡的潜质与内力”,坚信她会创作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来。

蔡东与她的三个作品

□陈涛



吴 臣 摄

在文艺复兴之后,“人”开始在戏剧、小说等艺术中复活,人成为故事的主体,成为有情感、有智慧的精灵,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展示着万千世界。及到了“作者死了”、“上帝死了”和“人死了”之后,人失去了灵魂,只剩下一个皮囊,蹉跎在物质欲望的街头。进入21世纪,资本逐步渗入小说创作,让更多的小说家面临着物质的蛊惑,丧失了真理的追求,平面化、影像化的写作层出不穷,小说成为“单向度”的出版物。小说的创作越来越流于形式,灵魂缺失,思考被感性直观放逐。陕西作家侯波就是一位思考之后而写作的作家。

一、底层生活的尴尬

进入了21世纪,城市化进程加快及其全面奔向小康社会的旗帜指引,底层生活的身份从“农民”变成了“农民工”,生活方式从“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变成了城市生活的流浪者。在城市文明和农村文明交融碰撞下,底层生活愈发出现了生活理念的多元化。

小说《女儿泪》讲述了农村计生员小芳捡到一个丢弃女婴抱回家里抚养,同时协助派出所杨勇寻找丢弃女婴的父母。在侦破弃婴案件中,小芳遭到了男朋友云强的怀疑、母亲的的不理解和村子里面其他人员的消极对待,甚或小孩编成歌谣的暗讽。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将弃婴案查了个水落石出。但是,结果是苦涩的,弃婴是小芳的亲外甥女,是小芳姐姐的女儿。在一个侧面上,小芳所遇到的尴尬不仅只是“她”所面对的,而是像她一样在基层计生工作岗位上的所有员工必须面对的事情。法理与情理的较量,自古至今,没有能够说得清楚的。所以,小芳式的基层工作人员面对百姓工作的无奈与尴尬只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如果说小芳、杨勇的尴尬是因为他们的年轻,他们的职位不够高,他们不能操控事情,只能执行事情,